论我国开放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始终是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如何使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这一问题已有诸多学者展开研究。其中最为经典的是由李嘉图提出，赫克歇尔-俄林等人修改并完善的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构建的竞争优势理论。应当如何看待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立还是互为补充？怎样利用好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下获得最大收益，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这一论题我将分三个部分展开叙述。首先是对开放经济下我国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理解，包括概念和发展历程，以及这一理论的优势和局限性；其次是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二者间的区别与联系，怎样将简单的静态化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变化的竞争优势；最后是怎样利用好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贸易先机。

在理解比较优势理论之前，应当对比较优势与相对比较优势进行概念区分。比较优势是指某一生产者与另一生产者生产同一商品时，前者的机会成本低于后者的现象，这又被叫做绝对比较优势；而后者则是将范畴划定在了国际贸易中，国家间生产同一产品，一国生产的机会成本低于另一国家。显而易见，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比较成本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应当依据相对比较优势原理开展。他指出各国出口各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进口本国具有相对比较劣势的产品，以此实现贸易互惠互利和利益最大化。李嘉图的理论随着时间的发展存在相当的理论缺陷——它只考虑到了单一生产要素即劳动下的贸易情形，这与资本主义后期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等多要素迅速发展的社会状况所不适用，因此赫克歇尔-俄林模式对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完善和进一步拓展，提出了所谓的要素禀赋理论。它主要研究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的情况下所导致的各国生产要素的差异化价格，并以此来探究国际贸易的原因。显然，开放经济下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行业内也存在同质化产品和差异化产品的贸易交流，这一情形下资源禀赋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因此学界再次引入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揭示了差异化产品的行业内贸易，它指出开放经济下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基础已发生变化，不再仅仅因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带来贸易，更多应当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等不同角度思考国际贸易的形势。新贸易理论不同于以往的国际贸易视角，它从一国的国家内部或是行业内部思考问题，这也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存在在哪些方面？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缺少的生产要素主要是技术以及资本，而具有的优势主要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由此观之，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中国的人工成本低，资源价格低，以及交通运输成本低等。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基本上满足此模式：以进口技术密集型的设备为主，出口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纺织、服装、玩具等为主。比较优势或许在短期给我国带来贸易红利，但应当思考的是此贸易结构能否长期化，我国的经济战略制定能否只依据比较优势原理制定？

理论上相对比较优势能够实现各国的利益最大化，但这一理论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首先，它颠倒了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忽视了生产力在一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次，比较优势理论只看到了自由贸易互利互惠的一面，但是忽略了贸易不平等问题。按照比较优势，我国更适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产品。但在中美贸易对峙时期，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卡脖子等问题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弊大于利。第三，它割断了经济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忽视了政治因素和国家利益在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中的巨大作用。相对比较优势实现双赢的前提是双方平等开放、互利互惠。如果一方采取制裁和贸易上的限制，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会失去意义。国际形势波诡云谲，经济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相对比较优势理论会造成国家生产制造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综合国力较弱的一方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正是出于此理。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比重越来越高，2021年粮食进口总额再创新高达1.6亿吨，占我国当年粮食产量的26%。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主动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按照李嘉图所说，我国粮食产业相比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相比并不具有比较优势，那我们应当进口粮食而出口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玩具制造业，服务业等。中央之所以提出与相对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经济战略，其根源在于自主发展对于一个主权国家的重要性。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属性，自主发展要求国家具有完备的产业体系，能够不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独立发展，这也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原因。在全球化化进程中，我国始终坚持自主发展战略：第一在生产力方面，我国坚持科学技术的自主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充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央政策体现了我国对自主发展道路的坚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我们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和贸易制裁的重要武器。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不能仅考虑比较优势原理的应用，而应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保证国家主权与健康发展。自主发展从生产关系关系方面看，主要取决于国家是否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甚至是制度和政策的选择是否具有自主性，有力的地方和中央政府是政策自主性的前提。我国能够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实现制度和决策自主，保证国家的独立发展。

与此同时，单纯的考虑比较优势理论可能会对产业结构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影响。过度依赖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会不断强化本国的低水平产业结构，贸易剪刀差将长久存在于我国的国际贸易中，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差距，可能会使我国最终落入“比较利益陷阱”的深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原先的廉价劳动红利已面临枯竭问题，甚至出现东南亚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发展不能以外向度为唯一指标，甚至牺牲产业结构高度的目标，特别是最近提出的内需战略对本国的国内市场开发利用提出了更高要求，过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热潮应当作出相应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成为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片面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出口甚至会造成国内需求漏出，不健康的国际贸易结构无法给本国带来有效需求，更不能带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挥发展，增强抗风险因素，抵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贸易变动。

进一步思考我国应当怎样调整产业结构，占国际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的经济战略制定必须将竞争优势理论纳入考量范围。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提出竞争优势理论，他的理论主要考虑国家之间的综合优势差距，认为不能单纯的从比较成本优势角度思考问题，应当兼顾其他一切影响一国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垄断力度、品牌效应、国家政策和制度环境等等，只有真正的竞争优势才是决定产业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这一理论以钻石体系为核心，解释了产品差异型高层次贸易竞争优势的构建，需要体系中的五个重要因素相互配合，即多种生产要素的结合、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业战略的制定依据同类企业的竞争、需求条件的科学理解和贸易机会的把握。其中，生产要素不再局限于单一角度，而是更多的考虑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完善的基础设、专业化的研究机构等等高附加值的新型生产要素。与此同时，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下，政府对于行业集群的扶植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着导向性作用。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上仅依靠市场力量可能缺乏充足的改革动力，证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产业法规对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进一步合理化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充分体现出地方政府干预产业转型的合理性，说明市场的力量与政府的干预在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能够呈现出协同互补而非相互排斥的作用。私营企业作为资本具有明显的逐利性，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在起步阶段通常需要高昂的研发资金，甚至面临较高的失败风险，这使得许多企业望而却步，仍然停留在安全且高收益的低水平产业扩张上。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例如农业，收益较低但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甚至是关系国家独立发展、不受国际控制的国防军事科技，都是民营企业无法进入或不愿进入的。此时政府的产业政策将起到绝对的引领作用。政府的资金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更为雄厚，有利于高科技企业对抗经济风险，免去后顾之忧。国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补贴政策丰富多样，包括，但不限于高额的税收减免，一定程度的资金补贴，人才落户战略，享受土地房租及节能减排扶持政策或亏损结转年限增长等优厚的补贴政策。

在初步对比较优势以及竞争优势理论有所理解后，应着手思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国情探索开放经济下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有学者指出竞争优势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否定，两个理论是互相排斥对立的关系，这一认知是片面的。结合林毅夫、洪银兴等人的理解，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两者存在天然的有机联系，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可以说，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的延伸和发展，比较优势理论是任何和发挥竞争优势的前提，二者对于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都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学界对于贸易理论的认识是循序渐进发展的，不能否定前辈对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探索，它作为竞争优势的理论奠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也具有相当的地位。我国应当发挥比较优势，但不局限于比较优势，努力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扶持新兴产业，抢占贸易制高点，建立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比较优势只是静态理论，它假定各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外部环境不会发生改变。但是不论是比较成本说还是资源禀赋说，这些理论都是的前提都是各国的生产条件和供给状况处于一种静态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各种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均不能在国际贸易间自由自主地流动，那么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和产品才能有垄断优势。但在形势复杂的国际贸易中显然只是理想化模型，现实中决定各国生产力的条件是不断在变化的，开放经济一下，生产要素和资源能够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因此需要引出动态化发展模型——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的动态性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综合性和变动性，综合性是指它对生产要素的结合考虑，认为一国的竞争优势是将管理、资本、技术、劳动等多种类生产要素结合考量的结果，变动性是就国际环境动态变化提出的，这与当今的开放经济息息相关。波特认为竞争优势不是永恒的，而是可超越的。竞争优势分为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创新推动阶段以及财富推动阶段，国家惰性产生可能会导致原有竞争优势的消失，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和经济赶超提供了理论基础。

单纯的比较优势并不等价于竞争优势，主流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劳动密集型产业未必是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也无法引领本国的产业升级。首先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资源都可以在国际畅通无阻地流动，这使得廉价劳动力不再是我国的特有优势；与此同时，新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自然资源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甚至改良再造，那么石油等原来的”硬通货“最终可能找到替代资源，不再是中东国家取之不尽的贸易金库；此外，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的能力和综合素质，来克服其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劳动并不能直接成为国际竞争的优势，劳动的不均质特性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不单在于成本低廉更在于它内部所凝结的人力资本含量。马克思指出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例如工艺精湛的瑞士手表，其附加值远高于我国流水线生产的低成本石英手表。一块瑞士手表的净利润可能是无数廉价手表无法实现的，同时其技术的垄断性又决定了产品的独特性与不可复制的特性，这使得瑞士手表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此外，降低产品成本并不只有廉价劳动力这一项选择，在生产过程发达国家甚至可以中加入更高层级的组织协调和管理水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更高品质的产品，也能够实现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的目的。由上述两个例子得知简单劳动所的比较优势并不等于真正的比较优势，廉价劳动力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是不稳定的、可替代性强、附加值较低的优势。因此，如果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真正的优势地位，我国不能局限于比简单劳动的比较优势，而要将其转化为复杂劳动的比较优势，或是与国外先进技术产业进行结合，根据市场需求创造竞争优势。

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林毅夫也指出，国家只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够实现其竞争优势，赶超型的跳跃式经济很难达到快速发展的作用。所以为实现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首先应当认清自己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我国目前对于比较优势的认知和发挥已经十分到位，但想要实现向动态化竞争优势的转变，必将经历惊险的跳跃，最为关键的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自1978年来经济始终处于高速平稳增长的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始终根据本国的比较优势来调整产业升级和发展的路径，但至2006年后，我国的产业发展道路不再一帆风顺，市场需求和国内国际环境的重大改变，令我国比较优势的演化面临较大压力，甚至到2008年出现了比较优势的局部性断档，如果不理解采取解决措施走出“比较优势陷阱”，我国可能面临进一步的经济衰退。若想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这一目标，我们大致有两种途径，首先是自主创新和研发，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第二是结合国际市场需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产业优化本国产业结构。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健全产业链、增强供应链产业链韧性的角度而言，第一部分自主创新的努力尤为重要，也是我国党和政府始终在大力推进的。目前，我国仍属于低水平的出口导向战略，即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替代初级产品出口，这不利于本国的产业转型。我国必须用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替代原有的低水平劳动密集型产品，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鼓励出口的政策就必须有所限制，我国应当鼓励发展技术含量高产品来代替原有的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层级的产品出口，增加我国产品的品牌效应和附加值以提高国际竞争力。张其仔根据比较优势的演化路径，提出产业升级的线性升级和非线性升级两种主要路径。线性产业升主要由四种产业升级方式：产品的跨产业升级、产品制作工艺的升级、产品本身的升级和多样化功能升级，它们是根据全球产业链视角提出的；后者可以分为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和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岔。当然，选择何种路径进行中国的产业升级并不是一拍脑袋的决定，判断我国究竟更适合使用产业内升级或产业间升级两种中的哪一种模式来推动另一种模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的比较。结合我国发展的国情和中国的实践来看，以产业间升级来带动产业内升级可能更加科学合理，原因在于它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和出口的高增长，推动经济平稳运行。

与此同时，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后发优势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在国际中的竞争优势。发优势最初是由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于1962年研究二战后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迅速发展的经验，撰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时提出的理论，它也被称为“落后优势”。后发优势的核心在于汲取前人的经验，即发展中国家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代价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同时它的发展也有经验可循，在原创制度或技术的成本上远低于自主创新的发达国家，从而具有后来者居上的优势。后发优势观点起源早，发展快，已有较多学者针对其进行不同方面的分析。列维、格申克龙、罗蓉渠、林毅夫等人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后发优势的主要理论。经概括，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本、制度、技术、人力资本、经济结构五个方面。后发优势认为后发和先发国家间存在技术水平和科技创新上的较大差距而产生的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成本，更快速率的促进技术的进步。从这一角度思考中的经济转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西欧、美国等发达的国家的转型思路，甚至在科技创新上也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实现突破，这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竞争优势。但是要警惕与后发优势并存于发展中国家改革道路上的后发劣势，它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待技术革新问题，认为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丧失了参与研究和开发的能力，无论怎样的低成本技术革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始终存在技术上无法逾越的一条沟壑，即所谓的后发优势陷阱。因此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除了利用好后发优势，也要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尽可能的摆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扭转卡脖子的局面，加快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

第二就是从引进国外先进产业优化本国产业结构。应该注意的是，在开放经济下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不能采取闭门造车的封闭式升级，应当发挥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优势，在把握住国际资源的基础上，利用好国外的先进技术以及充足的外资，引入国际先进产业进驻国内市场。新加坡的产业引进经验值得我国学习，作为地域狭小且资源缺乏的花园城市，新加坡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产业部门，鼓励国际著名跨国公司落户新加坡，促进了本国的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建立起独特的国际竞争优势。对于外资的利用，必须讲求高水平和高质量，如果一味地引进低端产业和低水平外资，那么外资利用越多产业结构劣化可能越严重，在此基础上我国应改变原有的外资引进战略，提高引资引技的要求，重点引进高技术产业，推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综上所述，我国的简单劳动的比较优势未必是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全球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开放经济大背景下，我国更应该着力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自主科技革新和引进先进产业等方式实现旧有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此基础上，也必须结合当前国际贸易不稳定的大背景，不能过的依赖国际市场，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而是应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更加地注重好国内市场的利用，发挥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避免收入和需求的国际出漏。必须在全面认知并利用好我国比较优势的前提下，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将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为动态的、综合性的竞争优势，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经济研究,1997(06):20-26.

[2]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2003(07):21-28+66-155.DOI:10.19744/j.cnki.11-1235/f.2003.07.004.

[3]庄丽娟.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04(03):59-61.

[4]张小蒂,李晓钟.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J].学术月刊,2001(06):19-26.DOI:10.19862/j.cnki.xsyk.2001.06.005.

[5]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1999(05):4-20+204.

[6]韩永辉,黄亮雄,王贤彬.产业政策推动地方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发展型地方政府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2017,52(08):33-48.

[7]张其仔.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8(09):58-68.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08.09.006.

[8]魏守华,石碧华.论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02(01):59-65.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02.01.007.